

LAMUGATUSA
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拉木·嘎吐萨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纳西学丛书 拉木·嘎吐萨◇著



民族出版社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拉木·嘎吐萨◇著

LAMUGATUSA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拉木·嘎吐萨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木·嘎吐萨纳西学论集/拉木·嘎吐萨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8

(纳西学丛书/白庚胜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08468 - 5

I. 拉… II. 拉… III. 纳西族—民族文化—文集
IV. K285.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182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hs.com>

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210 千字

印数: 0001 - 2000 册 定价: 27.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8468 - 5/C · 242 (汉 219)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64224782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
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
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
之？”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的傲
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
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
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
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
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 30 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
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
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
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
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末，纳西
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卓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
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
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

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至今为止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厓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壁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而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纳西学已经产生《厓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厓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铎、余嘉华、諏访哲郎、和发原、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

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品正、牛耕勤、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我们也可以由此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之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的存在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作出突出成就者均列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士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其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刘永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和苏州市蔡琨先生、庞欢先生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饱受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

于北京寓所

一个放牛娃来到了科学院（代序）

——一个牧童的学术自述

我的家乡在遥远的金沙江边。在那条日夜不停咆哮而去的大江的边上，镶嵌在群山怀中的一个村庄——格庄，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在8岁读书以前，我是放牛娃。牛静静地在山坡上吃草，我也静静地坐在草坡上，望着金沙江流去的远方，想象着大山的那边有什么，但怎么也想不出什么来。问过母亲，可我母亲也从未离开过村庄。她说：“没有去过的地方，你做梦都不会梦到。”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连梦都梦不到。我感到了一丝失望。

从8岁进小学到五年级毕业，我的汉语一直说不通顺，因为我的小学生活中，老师都是用双语，汉语要译成摩梭语，我们才能听懂，但很多汉语的概念和意思在摩梭语中是没有的，所以课文都会背，但意思知道的不多。所以，在日后的无数次填表中，有一栏“懂何种外语”，我总是填上“汉语”。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印象最深的是每个夜晚的村中心燃起篝火，批斗地主富农，我父亲排在“坏人”的最后一个。他虽不是地、富，但1956年宁蒗叛乱的时候，^① 17岁的父亲血气方刚，别了一把腰

^① 1950年蒗县先在永宁成立，之后发生叛乱，1956年平叛之后，才在大村街成立彝族自治县。

刀就加入了叛匪的队伍。虽没有杀人打劫的行为，但只要是参加的人都必须交代。一开始，我和母亲都很害怕，为父亲担心。但是，第一场批斗之后，我开心多了。因为我父亲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讲故事的能力，那个批斗会，轮到我父亲交待就成了故事会。在叛乱时，每天干什么，谁说了什么，甚至连环境、天气及周围的动静都绘声绘色的表达出来，并且，他所说的还得有其他在场者的验证，大家都说我父亲说的一点没错。我从父亲的故事中了解了小凉山很多地方的情景和民族风情。父亲是个乐观的人，虽然被批斗站了一夜，但回到家还会吹葫芦笙，让我和妹妹跳舞。那时，我有两个妹妹。

也许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我今后的职业选择也是置入了一点基因吧。后来，大约是三年级时，各个小学要到拉伯完小举行一次运动会。从我们村走到那里，要走一天的山路。我的老师阿绍春一路给我们讲《水浒传》，是用摩梭语讲的。我才知道，外面还有比我们村里的民间故事更精彩的东西。从此，我对故事、歌谣之类的东西十分痴迷。

人生需要选择，选择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所谓的命运实际是在你人生的关口遇到什么样的人。我十分幸运，我人生的每一个叉路口都遇到好人。在我读四年级时，“文化大革命”的风尾巴吹到我们那里，一些积极分子十分卖力地斗人（这样的人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有）。我父亲会木匠，学校之类的建筑都是他包的，这下又作为走资本主义的典型被游斗。但是，我的校长和乃武老师从不歧视我，还常常把我的作业在学校展览，让我在周会上朗读我写的作文给我点亮了心中的勇气 and 希望。

进入初中，那是刻骨铭心的3年。本来永宁中学是一所基础很好的学校，但拉伯乡要自己办中学，让我们36个同学睡在一个大溶洞中，在一座牛毛毡搭建的篷内上课。只有7个老师，有一个中师毕业的老师基本包干了数理化。糟糕的事，他所教的数

理化，到高中才知道大部分是错的。但幸运的是，我碰到一个语文老师罗学明，他有扎实的语文功底，完全得到他的指点，我看了不少他借给我的书才有了一点基础。那时，每天都是饿的感觉，吃的是美国卡特包谷面，喝开水，基本没有什么荤菜，甚至蔬菜也没有。罗老师还偷偷地给过我一点米和肉，我至今心存感激。一般说来，老师都比较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后来，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考上高中（36个同学只有两位考上，另一个是汉族同学高万强）。

进了高中，我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木培毅，他发现我的数学太成问题了，私下建议我去新华书店买一套当时十分火爆的“数学自学成才”丛书，好像是六本，上海出版的。我用四个星期的周末帮老师到山上背柴，凑够了八元钱买了那套书，但由于基础太差，没法看懂。一看数学，我就瞌睡，实在是对不起木老师。到今天为止，我做噩梦都在考数学，面对卷纸，我一筹莫展，醒来一身冷汗，数学对我是永远的噩梦。之后，我们又分快班和慢班，我分入快班，班主任又换成寸天鹏老师，他对我的数学绝望了。他说：我看你别在数学那里费劲了，干脆丢了它，把功夫用在其他科目上。我照他说的办，终于上了大学。那时的老师真好，多宽容，知道发挥学生的优势。哪像现在的老师，不是传授智慧和知识，完全是教考试方法和技巧。

我至今仍然固执地认为，大学主要不是教，而在于老师的点拨和与一批精英的结识。到大一的时候，有一个比我高一级的叫彭国梁的人，在领汇款单的收发室黑板上每个星期都有他的名字，我就去故意套近乎。他说是杂志社汇给他的稿费，他一五一十地讲了如何写，如何投稿。他是写诗的。我知道，写诗要想象，胡思乱想谁不会？我也会，于是就写起来了。那时有一个好处，投稿不用贴邮票，把信封右上角剪去，醒目处写上：稿件。我的雪片般的稿件撒向全国的许多报刊，又雪片般退回来了。后

来才知道邮资是报刊杂志付的，十分对不起那些报刊。我不知浪费了多少邮资。我班上的同学开始嘲笑我了，因为学习委员抱回的信，大多是我的退稿。

此路不通，另外找路。写诗看来不是我的强项，那就写散文。第一篇散文《苏理玛飘香的地方》投到《民族文学》。令人心跳的时刻到来了，一个叫艾克拜尔的编辑回信说，他们决定刊用，但有几个地方要修改，如果同意请回信。哪会有不同意的，立即回信，告诉编辑，你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只要能发表就行。文章终于发出来了，那份激动，无以言表。之后，著名的蒙古族诗人查干来了一封信，说我的组诗《小凉山：我的故乡》要刊用。我真把这组诗稿忘了，更没想到诗人查干就在《民族文学》，立即回信，表示感谢。后来，在文学上给予我帮助的人太多了，晓雪、米思及、赵克雯、梁晴、赵丽宏等等，可以写整整几页的名单。我真是幸运的，碰到那么多善良、真诚、无私的人。

大学毕业是人生的关口，经过4年的熏染，我喜欢上了昆明这座城市，想留在昆明。我有一个朋友叫顾谦。他说，他认识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李绩绪，因为他父亲与他是同学，他可以带我去见所长。我哪敢啊，鼎鼎大名的著名白族学者，连我们学的《民间文学概论》中都有他的专节，打死我也不敢去见啊。我求这位朋友，让他先去推荐一下我。他真的去了，想不到的是，没有几天时间，李所长坐了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到学校看我。经过面谈，他对我印象很好，但学校不同意我去社科院，因为当时的政策是师大的学生只能去教书。老师留下一句话：“曲线救国，你先回丽江去，但不要急于结婚，一家人更难调。”我一直记着他的话，在丽江五年，连恋爱都不敢谈。

就在分配前夕，我们的系总支书记找到我说：“你已经列入了第三梯队。”当时胡耀邦提出，要在大专院校选拔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入党政机关。这一点都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心目中最伟

大的是文学家，最神圣的是写作。当时，那个总支书记对我说：“当官好，当官好啊！”我根本没听进去，但转念一想，我至少不用去教书，先到其他部门再说。

分到了丽江地委组织部，由组织部再分到各个县去挂职。我却背着那另外八个第三梯队的未来领导，私下找组织部长和永昌，抱着那一堆发表过的浅薄的作品，软磨硬泡，就是不愿去当什么团委书记，一定要到一个文化部门。那时的领导真纯洁啊，我对天发誓，他连我的一支烟都没有抽过。他说：那你躲几天，先把那八个人分出去，然后你再来找我。我就去躲了几天，他们都到各个县去报到了。我去找他。他说：“你的作品我看了，的确可以，你还在读书就发表了那么多作品，你就到群众艺术馆吧，那里没什么具体的任务，你可以尽情地写你的东西。”于是，我就兴高采烈地到群艺馆去了。去了才知道，那个馆除了作家木丽青和画家木基新在没日没夜地写和画之外，其他人基本无所事事，好在那时三套集成工作刚刚开始，对少数民族的传说故事歌谣、舞蹈等进行新的普查。馆里安排我干这个事。于是，背一个录音机，走村串寨，找歌手，找巫师，七古八杂，只要是能说会道的，我几乎采访遍了，通过那几年，我几乎走遍了丽江所有的民族乡镇。后来与陈烈和秦振新一起合作，翻译出版了三十多万字的《云南摩梭民间文学集成》。可以说，这几年的田野经历为我日后从事科研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1990年，在李绩绪老师的一再努力下，社科院同意调我，但关键时候卡在了院里，还全靠当时的副院长高发元的帮助，使我这个放牛娃终于走进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最终，我进入了苦行僧般的学术领域，出版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学术作品。在1995年的时候，我的同仁邓启耀首先提出一个口号：“把在书斋里做干瘪了的学问做出鲜活来。”并且要“脚到，心到，手到”，我也欢呼雀跃地进入了这伙学者中。于是，

走滇藏线、川藏线入阿里，又在云南高原上四处奔波，搞田野考察不亦乐乎。我们认为，做人类学的东西，光在书斋里抄是不行的，必须要有自己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这类成果不少，但板着面孔，这个是那个、那个是这个的论文却不多。

我将一如既往地守住这张安静的书桌和干净的书房。因为我一个边远贫穷地区的少数民族小子，能走进省社科院是在许多善良的人帮扶下才做到的。（并且一定要坐稳了、坐热了）我永远不会停止自己的努力！

拉木·嘎土萨

2006.12.5

Contents 目 录

一个放牧娃来到了科学院(代序)

——一个牧童的学术自述 1

一种母系文化模式

——摩梭制造与保留 1

泸沽湖的诱惑与冲突

——摩梭文化管窥 13

摩梭人不是元代蒙古人后裔

——与王德祥、罗仁贵先生商榷 23

也谈《“走婚制”之谜》

——与王德祥、罗仁贵先生商榷 39

还摩梭人生活的本来面目

——对某些反映摩梭人生活的

文艺作品的批评 47

浅谈达巴教的教义及宗教行为 57

达巴文化中的文学色彩及哲学意蕴 71

与灵界的对话

——诗意的达巴 77

失语的边缘

——对一种研究现象的思考 85

另外的目光

——《无父无夫的国度?》评议 93

社会转型:文化的保护与开发

——以摩梭社区为例 103

试论拉伯摩梭家庭与婚姻的变迁 114

云南摩梭人母系文化保护和开发现状研究 122

文化多棱镜中的摩梭 153

草根绝唱 159

三代摩梭女的婚恋纪实 169

和谐与躁动之间

——对一个母系村落的观察与思考 181

永宁乡扎实摩梭母系文化和生态保护村

(个案调查) 190

拉伯乡拉伯达巴文化保护村 (行动计划) 197

达巴：泸沽湖最后的通灵者 206

泸沽湖畔的末代土司夫人 219

西行，沿着祖先的赶马路 228

后 记 237